

人民幸福感与党的宗旨实践的现实分析

胡江霞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幸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宗旨实践与奋斗的最终目的。从心理学的情感界定分析幸福的内涵,人民幸福感在本质上是围绕其需要和愿望的满足性状态而产生和变化的。伴随中国共产党宗旨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也在时代的变化中由“翻身道情”的主体地位满足,到改革开放的衣食住行改善,充分体验到快乐和喜悦的幸福感。但新时期在社会发展的快速行程中,人民幸福感的现实评价却出现了矛盾与纠结,集中体现在某些社会心态与情感表达的不满。为此,党的宗旨实践务必从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需求出发,在建立健全为人民服务机制与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自身宗旨践行的观念转化和作风调整。

关键词:幸福;宗旨;利益;人民;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105-06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开始,到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章程^[1],90余年来,党在为人民谋求主体尊严、地位、权益和幸福而奋斗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完善着宗旨意识与宗旨践行。回溯近一个世纪党的宗旨实践,其历史成就不容置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变了自己千百年来被轻视、被压榨的劳苦命运,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彻底改善了人民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带来了人民全新的幸福体验。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党的宗旨实践亦开始面临着现实的考验和困境,其最大的困惑是新时期人民幸福感的起伏纠结和社会情感的复杂变化,这对于“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警觉和研究课题,需要我们审慎分析、认真面对和积极寻求改进措施。

一、人民幸福的社会情感特征与心理变化

就幸福的概念属性来讲,目前能够得到思想家们基本认同的是把幸福看作“是一种情绪体验和情感状态”,《现代汉语大辞典》对幸福的界定也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在此,幸福的“境遇与生活”只是相对特征,且因人而异,但幸福的“心情舒畅”却是绝对特征,即便是“痛”,也还要有“快”的感觉紧随其后,体验者才有幸福感受可言。所以,解读人民幸福,当对最广大人民的情感生活,包括其社

会情感的特征与变化进行感知与分析,才能进一步探究什么样的境遇是人民渴求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人民满意的,以此推动党的宗旨的全面落实和深刻实践。

(一) 人民幸福的情感表现与社会情感变化。

依照情感观察解读幸福的特征与实质,首先,我们要认知和掌握情绪情感的概念与特征。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2]。从体验的角度来讲,情感是主观的,它往往带有个体化色彩,因人的主观经验、认知风格,甚至是智慧智能而有所不同。从反映的角度来讲,情感又是客观的,它常常依附于某种社会化生活,因客观境遇、生活实践和劳动创造而千变万化。依据情感的这种特性来认知幸福,一方面,幸福作为单纯的“一种情绪体验和情感状态”,它很简单,也很真实,人们体验到了当下的积极、快乐、踏实、温暖、尊严、荣誉、希望、信心等,也就油然而生地体验到了即刻的幸福,哪怕“挂一漏万”,哪怕转瞬即逝。另一方面,幸福作为主客体关系认知的反映,呈现着“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它又很复杂、很抽象,人们随环境和自身变化的同时,不断地改变和改进着自己的需要,并由此在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支持与反对的徘徊和

收稿日期: 2013-10-18

基金项目: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践行党的宗旨与实现‘人民幸福’的相关研究”(2012052)。

作者简介: 胡江霞,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

转换中,体验着一种由态度支撑的满意或不满意的生活,这种关联幸福的态度体验,或来源于现实中发生着的一件事、采取的一项决定、品尝到的一个结果,或来源于一件事中某人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甚至来源于一句承诺中的一个愿景幻想或一次体验中的一种预期联想,等等。

这说明,幸福易得也易失;幸福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幸福因个体境遇而存异,也因社会生活而趋同。但除却情绪特性的多面善变,幸福作为情感和态度的沉淀,它必然还有其内在认知的稳定性和一定背景下的延续性。无论简单或复杂、真实或抽象,无论满意或不满意、积极或消极,幸福都是我们生活世界偶然或必然的情感反映,它源于现实,也反映现实。

其次,我们要观察和分析人民幸福的社会情感表现与变化特征。从心理学的情感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幸福的情感在本质上是围绕人的需要而展开的,而需要的产生除了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生理状态外,更多的时候还是来自于人的心理状态,是人面对客观环境、时代特征及社会现实,通过感知、分析、综合后,形成的一种需求和愿望的满足性状态。

以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为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当人们穷苦到缺衣少食、尺椽片瓦时,吃饱穿暖是奢望,能免受欺辱压榨、安心活命,就是幸福;而在新中国物质匮乏、“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人们的基本需要似乎也并不复杂,新中国带给人民安全、归属、尊重等需要的满足,足以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和战胜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艰难困苦,幸福的满足也可以简单到穿上一件新衣服、吃上一顿白馍、住上一间新瓦房、骑上一辆自行车等等。

再以人们对主体价值和精神追求的社会需要为例,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尽管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任务极其艰巨和复杂,但就人民幸福的社会情感而言,新的生活、新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带给了人们一种兴奋和憧憬,尤其是那“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感觉,更是蕴涵着一种新生的激动和喜悦。这种积极的体验,应该说是完全得益于党的宗旨实践。那时,党在率领人民掀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高潮的同时,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自身的监督和建设,除了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外,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也以自身的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群体性地树立起了百姓敬重的公仆形象。正是这种共产党人本真的品德和朴素的

情怀,筑起了人民无限的信赖和拥戴。由此,我们看到并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物质贫乏也挡不住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的时代,人们气宇昂扬、精神饱满,热气腾腾地劳动、意气风发地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豪情,也充分享受着当家作主的幸福和快乐!

如果说新中国建设时期,人们因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沉浸于一种身份转变和人格平等的幸福中的话,那么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人们的幸福则更多地来源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思想面貌的更新,这种幸福,是因生产力的解放和思想观念的开放而带来的一种现代化生活新体验和全球化视野新感受的满足感。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着实让中国人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充裕、社会繁荣及个体自我设计与实现的幸福。而且,祖国的日趋强大和富足,也正日益赢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充分认同和积极性评价,人们逐步开始以拥有“中国”这张名片,品尝到其国际身份的提升和民族强盛的自豪,这种满足性体验不是个别人的个别反映,而是时代特征下人民幸福感的整体写照。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繁荣和GDP的一路攀升,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却日益衍生出精神世界的困惑和不满,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社会现象的出现,说明伴随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衣食住行的需求早已超越了生理学意义上“生存”的需求。生活世界的翻天覆地,让人们的基本需要不由自主地随着时代的进步附加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生存的底线从有饭吃、有衣穿、有屋睡、有路走,上升到有什么样的衣食住行,以什么方式实现和保证衣食住行的品质和提升。同时,人民社会心态的复杂与纠结,也说明了伴随人民幸福需求的量变与质变,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已不限于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认可本身,社会公正需求的满足与否,往往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幸福的感知和评价。

人民社会心理需求的变化与发展,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也是对党的宗旨践行的检验和检查。这就是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60余年中的期许、承诺,带给人民的是人们对幸福更普遍的意念,更深层次的追求,而人民新的幸福观也必然挑战着党的宗旨实践的深刻性和实质性。

(二) 人民幸福感的现实纠结与社会心态变化。

如果说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缺憾仅仅源于自

然经济的落后或资源的贫乏,人们或可以从心理生活的满足、精神世界的富有中找到自我的慰藉和信念的支撑,但如果基本需要的不满是由于社会不公正、党的宗旨践行不到位、甚至公权力运行不规范所致的话,那么,这种基本需要的不满,就有可能蔓延至社会需要、个体成长需要的茫然与困扰,人们不仅会丧失既有的生存信心,还会因心态变化而导致情绪障碍,及至影响幸福的感知。具体剖析当前社会“吃肉骂娘”现象,一方面透视着民众幸福感的现实纠结,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民众某些社会心态的变化与失衡,其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民众社会认知与评价中的怀疑心态和仇视情绪。社会“潜规则”的无处不在,不光因一部分公职干部渎职所致,也与一些老百姓“从众”于潜规则有关,但老百姓之所以参与其中,或可以解释为是在对规则本身和执掌规则的人产生了极度的怀疑、不信任,甚至失望之后,才不得已而选择的“权宜从众”。如为上学、就业、看病住院、包工讨薪、转岗晋级等托关系、找门路、递“红包”所耗费的心力和财力。当人们为生计、为尊严、为幸福的满足,不愿意但又“不得不”从众于潜规则之时,无论得之还是失之,大家都不会欣然安享结果,人们不光怀疑现有的一切——贫富的差异、职位的高低、行业的利益,及至政府的规划、党的宣传号召等等,还会从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中加深对社会现行规章与制度的怀疑,而且,仇视的情绪也随之滋生扩大,从痛恨公权腐败、怀疑公权私用、嫉恨“一夜暴富”、怨恨仗势欺人,到仇官仇富、质疑“勤则不匮”、质询“功成名就”,以至于出现行业敌视、阶层敌视及等级敌视。一旦人们怀疑一切,就有可能否定一切,因此,既有的幸福感也会在负面心态中变得越来越淡。规则信任不足带来的将是人民幸福的无助感。

2. 民众社会比较与预期中的“弱势心态”和压抑情绪。据《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公布的一个随机抽样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民众已高达七成。另据2011年2月出版的《小康》杂志发表的“中国官员心理压力报告”披露,由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根据对2010年参加其培训讲座的过万名机关干部所做的测验报告的不完全统计数据 displays: 参与者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全国普通人群水平,虽然大部分人情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

表现稍好,但也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比一般人更苦恼不安,情绪调节能力不足以应对他们面对的压力,有近1/3的人的人际交往属于较差或差的水平。本来,这两份报告的主要受访者,以其真实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来看,都难以称其是“弱势群体”,起码其物质生活和工作收入,是基本稳定且有一定保障的,但在心态上,他们却出现了自我防卫性的退行倾向:工作压力的不舒心、生活压力的不开心、未来预期的不安心和不放心,导致了他们不得不以“弱者”自居,以期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关注。“白领丽人”尚且如此缺乏自信与平衡,真正的平民百姓又如何能找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衡和快乐呢!“弱势心态”的群体性蔓延,只能说明不规范的权力运作和社会竞争,在带给民众以彷徨、失落、无助感体验的同时,也分解和麻木了他们对幸福的关注和品味。群众主体地位与能力自我认同的弱化,带来的将是消解人民幸福的缺失感。

3. 民众社会态度与行为中的逆反心态和哄闹情绪。伴随现代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自由与快捷,普通民众也有了畅所欲言的权力和平台,但细观当下群体舆论,总有一部分声音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贯愤怒着,即便可能存在着对突发社会事件的认知失真,然而不管大事小事、偶然必然,一些先声夺人的指责和攻击,往往开口就把国家、政府、党员干部或整个社会当作了其愤怒流淌的出口,想当然地选择着所谓的扬“弱”抑“强”。由此我们看到,不安与悸动、不满与躁动、不服与盲动等消极失望的社会心态,不仅借着网络舆情,宣泄在每一篇可供跟帖的评论中,而且也乘着社会焦点,移情于每一起极端或突发事件的归因分析中。言为心声,从社会生活事件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以看出,之所以丑闻、恶性事件的议论“门庭若市”,纵然大众心理的特性使然,但更有大众社会心态的逆反性宣泄。尤其当一些负面极端社会事件出现时,普通民众是偏向理性审慎之还是群起激情发泄之,这不仅是人们社会心态平衡与否的反映,也多少折射出了一定的“民心向背”。社会管理的疏漏和不健全,带来的不会是人民幸福的满足感,而是忧虑和不满。

显然,上述民众社会心态的失衡表现,既影响了人民幸福感的获得和体验,也反映了党在宗旨践行中存在的问题和考验。作为多元文化与价值取向碰撞的开放社会,言有个性、思有创新、行有不拘都无可厚非,但核心价值、公民规范、大众认同等也是一个执政肌体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一旦广

大百姓因规则或公平问题出现群体性心态失衡,甚至怀疑自己主体地位及主体权益的保障遭受侵害和威胁,那么,以谋求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为执政方向和奋斗目标的我党,其继续执政的基础和能力也就真正面临到了挑战和质疑。

二、人民幸福的现实需求与党员宗旨践行的路径思考

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党员宗旨践行,除了保持强烈的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之外,还要学习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情感,学会细致周到、优质科学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这就需要在建立健全为人民服务机制与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自身宗旨践行的观念转化和作风调整。

(一)以人民幸福的认知与感受,谋求更加贴心的服务机制和行为责任。

为人民谋幸福,一方面可以从人民眼中的幸福出发,在尊重和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过程中,谋求人民主体地位与主体能力的现实体验和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观人民眼中的“不幸福”事件,在分析和解除人民忧虑疾苦的过程中,赢得人民健康平衡的社会心态。在此,学会观察和排解具有代表性的“民愤民怨”,其实也是我们理解和倾听人民新的幸福需求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正视民众的心态偏差和情感困惑,党员干部应放下自己的“身段”,在群众的生活世界中谋求自己服务者的角色位置和角色心态。

1. 摆正自己的服务心态。从换位思考的角度来看,广大党员干部应注重摆正自己以下两方面的心态:第一,摆正自己倾听的心态。与群众在一起,要学会变“独唱”为“合唱”,除了善于倾听不同群众的不同声音外,还要好话坏话兼听,尤其是批评的话、难听的话。老百姓“骂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党员干部对群众的骂声置若罔闻、不屑一顾,甚至以势压人。要知道,当“群英会”变“独角戏”时,老百姓不捧场、不凑热闹了,我们的戏又如何能表演得下去呢?参与的人减少了,群体的力量、智慧及热情自然也就减弱了。第二,摆正自己政绩的心态。党员干部的政治抱负和成就心理,首先应放在党的事业和宗旨践行中去考量和实现,其次才是个人的“志在必得”和所谓的“政绩丰碑”。以此心态对待自己的工作业绩,上级评价很重要,下级、群众评价更重要,要把换位思考、察言观色、处“弱”不惊等这些为人之道,多用于面向群众,而不是琢磨领导,这样才

能在不断解决与稳定发展相关的深层矛盾、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突出问题中,抒写好自己作为执政党干部应有的政绩篇章。

2. 促进自己的责任到位。广大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自己的责任,就要注重责任意识的调整:第一,调整好自己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天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意味着党员干部没有自己所谓的“特权”,只有为人民谋利益的职权和如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实现的责任。所以,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应远远大于其权利意识,有责任意识,才能管理好、运用好手中的职权。在此,“确责、履责、问责”,不仅要面向岗位职权,也要直接面向群众权益和群众的社会情感,任何有损于群众社会情感的言行,都当追究其相应党员干部的责任,这包括懈怠职权、漠视职权和滥用职权等。面向群众,还要善于拉近与群众的沟通距离和情感距离,必要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尤其是窗口服务的部门领导,应面向群众敞开其沟通和宣泄的渠道,只有开门闭门都能看见群众的喜怒哀乐、抬头低头都能听见群众的利益诉求,我们才能确保职权的履责尽责。第二,调整好自己的“份内”职责与“份外”职责的关系。岗位职权有分别,服务群众无区别。事关党内利益,严格遵守党纪党规,不得越俎代庖;事关群众利益,没有份内份外,每一个党员都要善于发挥其服务作用,宁可自己辛苦,不让百姓受苦,要防止逃避、推诿责任,只有党员干部人人勇于担当,责任才能造就公信力。

3. 提升自己的“能力地位”。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提高和拓展自己的服务能力,必须明确两种关系:第一,明确岗位责任与岗位能力的关系。职位意味着责任,责任意味着担当,而担当则需要一定的能力。尤其在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的今天,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党员干部,需要提升的不仅是自己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还有更为重要的服务能力和责任能力。那种不搞“面子工程”就显示不了自己的政绩、不“折腾”就无法实现发展指标的干部,只能说明其服务能力不足、责任能力也不强。在注重科学发展、和谐稳步前进的今天,领导干部的担当,应既面向人民幸福的宏伟愿景,也关注到老百姓当下的幸福感受,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有统筹兼顾、深谋远虑的能力。第二,明确人民公仆与优质服务的关系。服务的本质是为他人利益而工作,人民公仆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但人民满意否,不在于得到服务否,而在于得到了怎样的服务,因为服务有主动与被动、高层次与低层次、高质量与低质量之分。显然,要赢得

前者,不仅取决于服务者的态度,还依赖于服务者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优质服务和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以下几方面能力的表现和运用,如领导者相关的专业素养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爱岗敬业的能力,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能力,主体独立思考和思想表达的能力等等。如果一个领导的能力弱化到没有“智库”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事故”就没有专业判断和要求,没有他人的稿子就表达不了自己的思想,那如何能赢得工作的主动与创新,又如何能赢取百姓欣赏的目光和真心的敬佩呢?倘若真能如其他行业成功的“偶像”或“明星”那样,以自己的本领赢来成千上百万百姓“粉丝”的热情与追逐,我们也不妨提倡多出一些这样的“政治明星”。事实上,人民公仆能否对人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不在于其“职务地位”的大小,而取决于其“能力地位”的高低。这就要求无论身处何种“职务地位”的党员干部,在服务人民的“地位观”面前,都应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地位”,而且,“能力地位”是没有高度限制和指数限定的,人民群众的拥戴和信任,就是其最高最大的“地位”认证。

(二)以人民幸福的诉求和愿望,建立更加科学的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发展”,但人们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不乏抱怨和忧虑的情绪。因为随着发展脚步的加快,由发展的速度与品质、规模与规范、硬件与软件、工程效益与环境维护等之间的失衡、矛盾或冲突所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假冒伪劣产品与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出、公共服务与社会监管的不力、建设工地的混乱与污染、项目工程的高耗与低效等等,所有这些混杂在“发展”中的“副产品”,对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喜悦心情而言,都不能不说像是一种笼罩在幸福上的“雾霾”。

面对民众切身利益遭遇的窘困,回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中,我们确有必要反思“追求发展”应有的方向和道路。就如追求GDP的意义,追求经济发展,本来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和幸福,但单纯考虑经济利益最大化时,是否已然背离了发展经济的本来目标^[3]。对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人民幸福而言,发展本身已不是最大的焦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发展的关键。因此,从人民的诉求和愿望出发,我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同时,真正要考虑的是怎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而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则会直接影响

到人民幸福的现实体验。为此,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服务理念,务必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1. 处理好发展中“动”与“静”的关系。人文关怀中的发展应是一种静水深流、润物无声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打破旧的国家机器,革命者必须以摧枯拉朽之气势、排山倒海之气概,同反动政权和势力进行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战斗,所以,毛泽东曾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4]。而今和平建设年代,要发展,当然也不会风平浪静,但历经新中国60余年风雨历程洗礼的中国人民,当下更想要的是高品质安稳恬静的生活。如何在顾及人民心理感受的前提下,把发展的“风声水响”、“尘土飞扬”控制在“不扰民”的阈限之下,这就需要发展者具有发展的人文理念与关怀。

对此,一方面,我们要扭转一些曾经的“革命性”发展观念,如“不破不立”、“大乱大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立竿见影”等,而代之以“润物无声”、“以静谋动”、“以新代旧”等人文呵护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发展的结果与过程、目标与手段的论证及实施,既让人民一段时间之后迎接到新发展的喜悦,也能充分享受和拥抱当下的生活。这实际上考验的就是执政者谋划发展的能力,要善于在大兴土木、大刀阔斧与小心翼翼、细致井然之间,找到发展的平衡与协调,即便是城市建设也一样,只要不是急功近利,人文关怀下的城市发展,是可以做到在呵护城市既有的祥和与便利之中,去悄然改变、谋划它的新变化的。

2. 处理好发展中“谋”与“让”的关系。人文关怀中的发展应是一种为民谋利、扶弱助贫的发展。党的宗旨精神告诉我们,无论市场怎样竞争、社会怎样创新、人们怎样突出自我,我党追求发展的特色和方式,都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框架。而要真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发展就必须在谨守公正、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以人文关怀的方式,通过“谋”与“让”的协调,充分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尊严,使之获得公民应得的合法权益和相应的主体地位。

具体来讲,为民谋利,一方面,应坚持法治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注重人民合法权益及主体地位的满足。只有建立健全社会的法治渠道及监督约束机制,让公权力运行于阳光下,才能防止不同利益集团的恶性竞争,遏止住公权滥用、公民权益被边缘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坚持助贫式的社会发展方向,注

重人民尊严愿望的满足。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幸福理论来看,强者或应更强,但弱者决不能更弱,更不能弱肉强食。我党执政的本质,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无论是集团利益还是国家利益,最终都应让渡、还原为老百姓个体利益的提升。

因此,我们不但要解决好“弱势心态”者的焦虑问题,更要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而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社会尊严,就必须从保障每一个社会公民劳动、生产、就业的权利开始,让劳动者劳有所保、劳有所得、劳有所值,使其在自食其力、自强不息中获得尊严;同时,要保障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生存与发展的幸福,就要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和改善,尤其要注重与百姓幸福感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住房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和支出。在此,政府财政项目中应避免雪上加霜的“马太效应”。“锦上添花”固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雪中送炭”、扶弱助贫,更能体现社会的温暖和人的美好与“类特性”,也更为普通百姓所需要。是为民谋利还是为利伤民、是让利于民还是与民争利,不仅是对党执政宗旨的考验,也是对社会公平机制的检验。

3. 处理好发展中“快”与“好”的关系。人文关怀中的发展应是一种注重品质、保障安全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刚从计划经济的某种“社会惰化”中解放出来时,压抑已久的创造能量急于释放,人民主体的奋斗热情也空前高涨,改革试点中“深圳速度”的创造,更是让人们领略和认同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发展理念。不能不说,中国经济建设与思想解放发展高潮中所带来的“效率”文化,对习惯于“老牛拉破车”、按部就班的传统中国人来讲,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但“效率”文化并非单纯的时间或数量追求。倘若发展中只重快步不重稳步、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记进度不记深度、只要“面子”不要“里子”,那么,这种“效率”就不只是误读了时间的意义,它还很可能埋下生命的隐患。

现实中,某些受利益驱动的“效率”追求者,包括某些受“任期效率”驱动的领导干部,在其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屡踏道德底线或法律底线,甚至出现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就是因其“效率”视野里没有“长线”,只有“大鱼”,哪怕丢炸药、放毒药,也要先网到“鱼”再说,这种“效率”不仅带来了人们社会生存的恐惧和压力,也造成了人民社会信任度的下降甚至危机。在此,我们反思“效率”文化,科学的效率观,应该是效率中创造的生命价值和品质意义,即在快的速率中创造出好的、经得起时间和质量考验的效益。

恪守效益的品质追求,一方面,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干”、稳稳当当地“上”,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经久不衰”,生产是如此,人的发展也是如此。“功夫”做到家了,自然会有人民的赞助和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性对待利益与风险、投入与回报的关系,以认真负责的意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发展过程中利益的“舍”与“得”,谨防效益决策因贪多求大而出现责任扩散中的“冒险”偏向。再一方面,我们还要重视效益的实质和内容,如搞竞争是为了创新水平的提升,讲效益是为了活动质量的提升,重消费是为了生产效能的提升等。提升发展的内在价值和品质,犹如积蓄一个人内在的聪慧与秀美,它不仅可以让发展之“树”常青,还可以让发展之“果”与日甘醇,在经受时间检验的同时,亦收获其应得的利益回报。

总之,党的宗旨是指向广大人民的利益,宗旨实践就当紧紧围绕人民主体的利益需求而展开。作为宗旨实践的代表,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善于观察人民群众的需求愿望、学会同感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真心顾及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发展,这是其更好地服务人民的情感基础和责任要求,有了相应的情感 and 责任,其服务人民的行为才能温暖有力、坚定持久,而人民也才能真正扫除心中的“雾霾”,安居乐业,安享幸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下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654.
- [2] 莫雷. 心理学[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82.
- [3] 江波. 关注人的幸福和发展是经济学的本来目标[N]. 中国社

会科学报, 2010-06-24.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05.

(责任编辑 何海涛)